



柳亚子

宋浩：柳亚子《图南集》重见天日，揭开一段香港“文化抗战”诗史

“劫后余生”，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文献传奇

文/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通讯员 孟肖
图/受访者提供

著名民主人士、南社领袖柳亚子20世纪四十年代流亡香港时期的诗集《图南集》，一直被公认为在1941年毁于战火。八十多年后，《图南集》手稿奇迹般现身，经宋浩、宋其蛟父子校订后，近日由岭南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份沉睡半个多世纪的文献遗珍，何以“劫后余生”？羊城晚报专访《图南集》校订者之一宋浩——



羊城晚报：长期被视为佚文献的《图南集》是怎么被发现的？

宋浩：上海进入“孤岛”时期后，在何香凝领导的国难救护队与中共地下组织相继劝说下，柳亚子于1940年12月13日乘“亚洲皇后”号离沪赴港。他将新居取名“舜楼”，寓意“后羿射日”，誓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1941年12月，日军突袭香港。柳亚子在炮火中携家人仓促逃离舜楼，所有在港期间的手稿及文献资料都未能带出。

《图南集》正是柳亚子于1940年底至1941年初寓居香港时所作的诗集，历来被认为已毁于战火。但其实《图南集》并未佚失，而是一直存于柳亚子的香港友人——陈君葆先生处。

《图南集》的发现，要归功于谢荣滚先生。他是陈君葆先生的女婿，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一直致力于整理、编纂陈君葆的遗稿，著有《赤子情深——陈君葆传》，并先后主编出版了《陈君葆日记全集》《赤子情深——陈君葆传》《陈君葆全集》等。2008年，谢荣滚影印出版了《陈君葆书信集》，其中收录有柳亚子致陈君葆的多通书信，由此，《图南集》的流传过程才得以厘清。1948年1月29日，柳亚子便请叶启芳将《图南集》原稿转交给陈君葆；1950年，柳亚子又致信陈君葆，请他派人将《图南集》抄写“录副”带往北京，原稿则请陈君葆留存，“为名山之藏”。

2018年，《陈君葆全集》中的诗歌集、书信集、文集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整理陈君葆的材料时，时任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胡峰、古籍辞书编

辑室副主任张贤明就已经注意到了《图南集》，并一直关注。直到2024年4月，在我策展的《水云留痕——陈君葆和他的朋友们》展览上，《图南集》手稿首次面向公众展出。当时我陪同刘斯翰先生看展，开始萌生了把它印出来的想法。后来，受岭南古籍出版社邀请，我们在2025年春节前后正式开始了校订工作。至此，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文献传奇，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羊城晚报：《图南集》具有怎样的文献价值？

宋浩：《图南集》全书共分为四辑：甲辑四卷四册，乙、丙、丁辑各一卷为一册，收录诗词351题538首。这是《图南集》已知的唯一完整稿本，可订正已出版的《柳亚子文集》中《诗词集》《文集》的大量疏漏，增补佚诗99题173首，甲、乙、丙、丁四辑的形态在此前是不为人知的；同时，陈君葆所藏为柳亚子手订原稿，封面皆为柳亚子亲笔题写，内文眉批、订正也是柳亚子亲笔。

我们在整理时做了几项工作：一是释文与对勘，根据原稿释文，与《诗词集》《文集》补遗中的《图南集》进行对勘；二是附录相关诗歌，将柳亚子1947年至1949年第二次抵港后撰写的《卷土集》《新生集》和《光明集》中与香港相关的诗歌附录于后，以便读者了解柳亚子在香港的完整历程；三是编制索引，将稿件诗题中的人名、地名等编制成索引，附录于后，希望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线索。

有朋友说我们这是“狮子搏兔”，花这么大功夫只做了一个附录。但我们觉得这项工作很重要，通过索引，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柳亚子在港的交游圈，以及战时香港的情况。

“以诗纪史”，日记式记录战时流亡的居港岁月

羊城晚报：柳亚子居港时期几乎无日不吟咏，平均每天创作四首，您怎么看待他这种“日记式”的写作方式？

宋浩：这是柳亚子一种记录日常的方式。别人用日记写，他用诗写。对柳亚子来说，写诗就是最方便的表达方式。比如，我们觉得发微信更方便，但他觉得写诗更方便。所以《图南集》中的诗歌以纪事为主，文学性的表达反而不那么多，史料价值更高。

我觉得这种日记式的写诗更有意义。诗已经写了几千年了，情绪表达大多是重复的，但事件总是当下的。甚至可以说，柳亚子的诗歌带有一种“新闻性”，它记录着当天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时代大事。除纪事外，《图南集》中柳亚子有诗句云：“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鲜明地袒露了他的政治立场与思想转向。所谓“以诗纪史”，如果我们把《图南集》当作1940年底至1942年初的香港“文化抗战”史，也未尝不可。

羊城晚报：《图南集》反映了柳亚子居港时期怎样的交游网络与日常生活？

宋浩：柳亚子身份特殊，是各方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他的处境，正如他所居住的“舜楼”，与杜月笙、许世英的住所三栋比邻。柳亚子在关于抗战时期的文章《八年回忆》中称香港这一年多的生活是“哑铃式的香港”，“我初到香港的时候，精神很兴奋，到了明年三月，衰弱起来，而下半年一交九月，则又转变为兴奋”，“两头热烘烘，中间冷清清”。

在这段“热烘烘”的时期中，他与多方人士往来交集，如国民党左派的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共产党人夏衍、乔冠华等；流亡香港的文化人士陈寅恪、洗玉清、端木蕻良等；香港本地文化人士许地山、陈君葆等；南社旧友杨云史、杨千里、邓尔雅等；北洋旧政客张一麐等等。除了交游，柳亚子参与的文化活动也很多，如参加文协香港分会、新文字学会，与叶恭绰等整理《广东丛书》，出版南明文献，与陆丹林等寻访宋皇台。因此，纪事、酬答是《图南集》的重要内容，忆旧之作也不少。他不仅记录了自己居港期间几乎所有的活动与日常生活，还记录了周围人的动态。索引中，我们还对诗中出现的香港地名、场所等进行了注释，许多地方今天依然存在。

龄、何香凝、彭泽民等；共产党人夏衍、乔冠华等；流亡香港的文化人士陈寅恪、洗玉清、端木蕻良等；香港本地文化人士许地山、陈君葆等；南社旧友杨云史、杨千里、邓尔雅等；北洋旧政客张一麐等等。除了交游，柳亚子参与的文化活动也很多，如参加文协香港分会、新文字学会，与叶恭绰等整理《广东丛书》，出版南明文献，与陆丹林等寻访宋皇台。因此，纪事、酬答是《图南集》的重要内容，忆旧之作也不少。他不仅记录了自己居港期间几乎所有的活动与日常生活，还记录了周围人的动态。索引中，我们还对诗中出现的香港地名、场所等进行了注释，许多地方今天依然存在。

“向南开一窗”，香港何以成为文化抗战大本营

羊城晚报：您刚才提到柳亚子居港时期是“两头热烘烘，中间冷清清”。这“中间冷清清”指的是什么？

宋浩：《图南集》截止于1941年5月28日，中间有一段创作的“空白”，直到9月份柳亚子才重新开笔。这段“空白”是柳亚子政治转向的一个关键节点，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脑疾”发作，我认为这更是一种政治上的蛰伏。

羊城晚报：为何说“《图南集》是柳亚子前半生的绝唱，此后开始了新我的生活”？

宋浩：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爆发。柳亚子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向国民党重庆当局发表宣言，反对“围剿共产党”。国民党顽固派恼羞成怒，于4月2日的八中全会上开除了柳亚子的党籍。皖南事变后，柳亚子接连写下多首诗作表达态度，《图南集》中1941年2月11日所作“男儿自分殉沙场，抗战何愁岁月长。只是闻墙成痛哭，江南一叶

涕纵横。”这首诗明确为“皖南事变”而作，诗中引用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题词，表达对事变的痛心和对叶挺命运的关切。

《图南集》写于形势最复杂的时期，也是柳亚子交游最广、接触各路人马最多的时期。此后，柳亚子的政治倾向便完全转向中共一边。这个转向，与当时许多文化人的转向也颇为一致，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文人抗战心路的一个镜象。

什么是“文化抗战”？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来说，能够不同流合污、保持气节，已经很了不起了。能不妥协，就是一种抗战；如果同时还能在文化上做保存、研究之事，那就更难能可贵。柳亚子不仅没有妥协，流亡香港，而且在那段“乞食南来，暂不请客”的异常潦倒日子里，还在整理南明史料、参加文化活动、为报刊撰写文章、调查古迹。他做到了，当时的许多文人都做到了。而柳亚子能够再进一步，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委委员，敢于在政治上发声，不惜被开除党籍也要发声，那便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了。

羊城晚报：您觉得抗战时期的香港，对于内地的流亡文人来说，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宋浩：陈君葆的学生小思女士说得特别好：“翻阅香港的历史，不难发现在祖国最艰难的关头，它往往能提供某种存活的机会，让祖国向南开一窗。”在我看来，抗战时期香港的地位，与“孤岛”上海、“大后方”重庆不相上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为大家提供了生存和活动的空间。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图南集》除了学术价值，还能让我们了解那段历史，了解香港对抗战的贡献，了解香港曾是我们抗战的“大本营”——文脉在那里得以留存。



“拆除鸟巢”或“适应世界”？

前段时间一封校长回信引发热议。深圳一高三学生备考冲刺受校园鸟鸣干扰，写信请求学校“拆除鸟巢”。校长公开回信称：认为学会与万物共存是成长必修课，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世界适应我们，而是让我们学会与世界相处！

——校长回信受到赞誉，但也有很多人认为校长在“上价值”中回避了问题，以成长为名消解了“如何免于噪音干扰”这个具体问题。如果对问题都是适应与接纳，那世界可能就不会有进步了。

许多年轻人则站在提出问题的学生角度，讨论如何利用现代科技、通过AI解决鸟鸣噪音这个具体问题。看到一个留言很是感动，她引用了作家萧伯纳的话：一个理智的人让自己适应这个世界，不理智的人让世界适应自己，这个世界的进步，依赖于不理智的人。

——是啊，传统时代人们只能适应自然的酷热、寒冷、缓慢、风沙、噪音，现代科技和文明的每一进步，包括人工智能，不正是人们“不甘于适应”追求中所创造的？如果困难能用现代科技去解决，为什么非得逼着人用精神去克服？

张雪夺冠后，也有一篇文章反思“我的博导也是于摩托车发动机的，他为什么没干出来”。浙江宣传也接过了这个问题讨论“博导和‘张雪’们隔着多远”——这个让博导们尴尬的问题，从AI创新实践中可以找到答案。



为《治家格言》铸印

明末清初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1627—1698）的《治家格言》是相当有名的。我虽然背不出来，但开头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简直是大白话，通俗易懂，又颇有道理，所以一直不忘。

而今，有一位年过七旬的海上篆刻家刘葆国先生，不仅对《治家格言》十分喜爱，而且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把全篇524字的《治家格言》刻成了一部别致的印章——《朱柏庐〈治家格言〉印集》近日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推出，十六开精装，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刘先生是篆刻大师钱君匋先生的高足，又善于融合古今，博采众长，治印清隽典雅，已自成一家。他前后花了整整六年时间，通篇篆刻《治家格言》，共得印六十一方，后又部分重刻，并修订跋款，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接着铃印拓款成谱，至2023年终于大功告成。这样严谨的创作态度，不能不使人佩服。

刘先生还请文化界同仁题签、题引言、作序和题跋，包括刘小晴、童衍方、余秋雨、韩天衡、熊召政、陆康、徐建融、刘一闻、钱文忠等。他们各抒己见，使这部印集又成为一部别有情趣的文人雅集。

乡村新貌
图文 齐振松



鳄鱼与乌龟

卡拉姆乔尔(Karamjal)位于孟加拉孙德尔本斯森林深处，是一个遐迩闻名的生态旅游胜地。其中的鳄鱼繁育中心的一处围栏里，关着一条鳄鱼和两只乌龟。那天，我在此目睹了一幕饶有趣味的小插曲。面目狰狞的鳄鱼，从人造池塘中缓缓爬上来，阴冷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池畔那两只相依相偎的乌龟，似乎想要伺机而动。强敌当前，乌龟却安之若素，神态从容，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中。

我莞尔，因为就在那一瞬间，我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两句有趣的歇后语：——“乌龟咬西瓜，无处下口。”——“乌龟咬整颈子，有得纠缠。”

这两句歇后语，只要稍作改动，便完全切合当前的情景了：——“鳄鱼咬乌龟，无处下口。”——“鳄鱼咬乌龟，有得纠缠。”

乌龟，行动迟缓，却能在“龟兔赛跑”中出人意料地胜出，被世代传颂，成为象征恒心与毅力的励志故事。

乌龟，形体细小，但在令人闻之色变的鳄鱼面前，还是泰然自若，且还发出了无声的挑衅：“嘿嘿，你放马过来吧，谁怕谁呢？”

天生我才必有用。就算全天下的人都看扁了它，可它深知做事只要步步为营，不半途而废，便能应付任何挑战；而那一身坚硬的甲壳，更是与生俱来的“护身符”，能帮助它安然度过任何危机。

浙江开化县池淮镇立江村，田野广阔，油菜花田与翠绿的农作物田块交错分布，一条河流蜿蜒穿境而过，河畔民居有的屋顶铺设着太阳能板，尽显乡村发展的新貌。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wyb@163.com



小人物

当大屏幕上陆续闪现《小说选刊》年度风云榜一张张榜单的时候，身旁的陈东捷指着台上一个男人说：25年前，我推了他一部小说，到处转载，很受关注。然后，他不写小说了。25年后，他写了一个中篇，上榜了。我一看，一个鬃发闪雪的男人，全勇先，他的中篇小说《秘密》今年一月份也登上第十届收获文学榜榜首。

小说《秘密》以伪警察纪德荣的自述为核心，交织真实历史人物赵一曼（文中称“大小姐”）的暗线。纪德荣不是天生的革命者，他留过学，为生计成为殖民体系的执行者，是游走在黑白之间的“灰色人物”。他胆小、苟且、渴望安稳，但在目睹日暴行、接触赵一曼的坚韧不屈后，内心沉睡的良知逐渐苏醒。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在审讯时悄悄递上一杯热水，在追捕时刻意“视而不见”，以沉默与模糊的态度，完成对正义的微弱守护。

全勇先刻画出色世小人物的矛盾与挣扎，让读者看见：正是“选择”，决定了一个普通人在黑暗中站在了善良一边。

可能因为编剧的功力，《秘密》最精妙之处在于叙事结构。小说采用“作家‘我’去打听档案——审讯记录——纪德荣自述”的三重嵌套结构，层层包裹、虚实相生。真相，一直就像雾中风景，模糊、不确定，在场的每一个人的表现，都让读者的判断不断游移，但也让“秘密”的内涵不断延伸……

晚上聚餐时，全勇先说了他做记者时，所采访的一批老抗联战士，如何走入他们的内心？他说，收起摄像，收起镜头，静下心来，倾听，他们的戒备就会放下。那时，老人们心底的故事，才会倾吐……



一天内欧亚往返

走出大巴扎没多久，就到了苏莱曼尼清真寺，这是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的，位于高处，可以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里面不只是蓝色，还有其他各种颜色的图案，赭黄色和深红色，以及绿色。

我们向海边走去，走过格拉塔大桥，看到“欧洲区”升起的高地，帕慕克在书中写过的帝国末期建起的欧式大宅。大桥下面就是渡口，上船后，天气变得晴朗起来。一路上，蓝天碧海，海鸥追逐着我们。眼看着伊斯坦布尔古城远去，水汽烟雾中看着岸边高地上索菲亚大教堂的朦胧剪影。大桥一路经过昨天去过的多尔玛巴赫切皇宫，以及帝国末期的许多赫梯的豪宅，最后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最宽阔处，抵达亚洲。

博斯普鲁斯海峡里的海水都是激流，从黑海涌出来，经过这里到马尔马拉海，再注入爱琴海。看到海水中成群的水母。下船后一直走到少女灯塔，许多人在海边钓鱼，像是千百年来一直就这样，从来没有变过。乘车经过博斯普鲁斯大桥，桥身是白色的，纤细狭长，三个小时后又回到了欧洲。

晚饭后，走到金角湾海边，等天空渐暗下来，便看到白天去过的苏莱曼尼清真寺的灯光亮起来，更远处也亮起灯光，一时之间，看对岸黄色的灯火中都是辉煌的古建筑，这一刻犹如古老的伊斯坦布尔以及更古老的君士坦丁堡，甚至拜占庭，都复活了。海边不少人在这里等日落看海吃饭，猫咪也多，跟着人跑。海风吹着，这是伊斯坦布尔最美的一个夜晚。



非虚构的难处

这几年非虚构叙事很流行。尤其是针对基层群体，如女性、少数民族、低学历者。作者或是其中的一员，或是职业相关或经过详尽调查。《南方科技大学的少年》作者袁洁本是技校的老师，她自然是为我们揭开了面纱的一角，窥见生活的艰难与少年们的成长。

这些少年大多来自偏远乡村或城市底层家庭，中考失利后，技校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选择。16岁的阿明在汽修车间里，手指被扳手磨出厚厚的茧子，却依然专注地跟着师傅调试发动机——他说，“学会这门手艺，就能给家里寄钱了”。还有学电子技术的小宇，曾经因为基础差被同学嘲笑，后来在老师的鼓励下泡在实验室里，终于在省级技能大赛中拿到三等奖，领奖台上的他，眼睛亮得像星星。他们的青春没有象牙塔里的浪漫，却有着实实在在的汗水与坚韧，每一次零件的精准安装，每一次故障的成功排除，都是他们对命运的勋章。这些被主流教育忽略的少年，在技校的车间里、实训场上，用双手和坚持，一点点拼凑着属于自己的未来。

不过非虚构有一个难处，就是作者的姿态。几年前民俗学界关于田野调查者能否干预被调查的现实有一场大论战。我想，这也是很多非虚构写作者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可能干预事实没像原先那样发展；另一方面，即使写作者不做任何举动，但TA内心的姿态仍然可能影响，甚至是遮蔽事物的某一方面。这是非虚构发展的一种阶段。也许将来的发展会超越这个阶段。但现在的非虚构书写与出版，仍有这样的问题。我意不如放任它们野蛮生长一段再说。